

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聚焦“新世纪文学二十年” 中国当代文学终于“当代”了



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聚焦新世纪文学 省作协供图

新世纪文学已经走过二十年的历程,在这二十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日新月异巨大变化,新现象、新观念、新媒介、新挑战、新创作、新作家不断涌现。12月3日,由《扬子江文学评论》主办的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聚焦“新世纪文学二十年”,回顾总结了新世纪以来文学场域的重大发展、变化、重要成就。论坛由《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主持。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汪兴国出席论坛并讲话,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贾梦玮做会议总结。

由《钟山》《扬子江文学评论》合作的“新世纪文学二十年20家/部”评选正在进行中,将最终评出“新世纪二十年青年作家20家”“新世纪二十年青年诗人20家”“新世纪二十年长篇小说20部”“新世纪二十年非虚构作品20部”,目前刚刚评出了入围名单。

本次论坛可以看作评选的“学术争鸣”,与会的青年评论家大致是70后、80后,他们的大学教育或者说是真正具备专业意义的文学经验的起点,正好在世纪之交,可以说,新世纪二十年对应的正是这一代人真正走向文学道路的一段心路历程。由这群人讨论新世纪文学,相较于前辈和晚辈,应该有着特殊的视角、观点和意义。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铁西区、底层文学、非虚构,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回顾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从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讲起:1998年,上海的《萌芽》杂志创办了新概念文学大赛,韩寒、郭敬明等一批80后新星由此冉冉升起;若将视线投向东北,另一批80后,面对着当年父母下岗、全家为筹措九千块钱升学赞助费而苦恼的窘境。

“这跟当时的文学似乎一点关系都没有,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却是非常大的事,”黄平说。后来“九千块钱”等关键词频繁出现在这一批东北80后的小说里。

“为什么今天双雪涛、班宇、郑执这一批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年轻人那么喜欢,压倒了原先市场欢迎的郭敬明?”黄平说,这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因为东北书写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更能击中年轻人。“新世纪文学二十年,在青年作家的层面上,以都市为中心的青春文学,和东北书写中的伤痕叙事,隐隐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张力关系。”

据《十月》副主编季亚娅观察,新世纪文学二十年并不是一个完全同质化、整体化的概念,前后呈现许多变化。第一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新世纪文学有两个可以观察到的互相缠绕的传统,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以来的“文学性”传统,“先锋文学”是这个传统的寓言性体现;另一个是自五四新文学、自延安讲话以降的“文艺为人生”和“文艺大众化”传统。她开始读研究生的2004年,正值“底层文学”的兴起,后来又有2010年《人民文学》倡导走向大地的“非虚构写作”,这二者所接续的现实主义传统,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被更多地提出来。譬如生于1979年的鲁奖得主石一枫,直言自己的文学观是十九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标准,而“最年轻茅奖得主”徐则臣笔下的“北漂叙事”,也是一例。二是文学空间已经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位移,“如今想要找个当下农村题材作品不那么容易,即使是在乡村叙事,也是在城市化进程

里去回望乡村”。

除了题材、内容的变化,季亚娅认为,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生产机制亦有重大变化。一方面,作协系统继续通过文学期刊的出版和国家评奖体系的引导,想象、设计、规划着文学生产;另一方面,资本也在制造着自己的文学和标准。

以新经典为例,其操作方法是余华、格非等经典作家买断,再将市场整个铺满,销量动辄上百万,而相比之下大量原创文学到底发行量是多少,她“都不忍心说出来”。再如理想国去年推出的青年作家陈春成,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期刊作家,是通过理想国策划的图书与评奖出场的,首部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却卖出了30万册。

媒体的力量亦不容小觑。“非虚构”之所以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季亚娅觉得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媒体的推波助澜。“在做图书推广活动的时候,到底哪些作家是最出圈的?我发现很多读者知道梁鸿,却未必知道茅奖作家。”季亚娅说。而近来比较火的另一位非虚构作家,这次以《我的二本学生》入围“新世纪二十年非虚构作品20部”候选名单的作者黄灯,则最早是通过新媒体出场的,大量微信公众号文章的推送,使她成为舆论热点;接着图书成为畅销热点,然后反馈到传统的文学批评界。“作家出场的方式更多样。不像过去,作家要出来,先是通过主流文学圈认可。”大众的阅读趣味,大众对于非虚构的关注,促使季亚娅反思:人们需要的是更广阔、更有现实感的作品,而不是那些个性化的写作。

“在资本引领大众阅读的时代,什么是好的文学?如何将文学的标准真正对连接到文学阅读市场当中去?信息泛滥的时代,如何建立有效的阅读引领机制?这是我一直深思的问题。”季亚娅说。

寻找那些足以和前人写作形成“对决”的文本

除了非虚构,复旦大学教授金理指出,新世纪一个重要现象就是科幻文学的崛起。“长期以来,科幻文学跟纯文学在两条道上,彼此偶尔张望,并不特别在意对方。曾

经,科幻文学和科普文学是划在儿童文学类目的。到了今天,科幻已是不可忽略的存在,甚至在海外读者那里,科幻文学可能是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的甚或唯一一张面孔。”金理提出,在研讨新世纪文学的时候,一定要去寻找那些足以和前人写作形成“对决”的文本,而这样的文本就诞生在科幻领域,比如《三体》。

他还提到了青年作家糖匪的《袍子》,里面描写的主角“父亲”发明了一种叫作“刺影”的记忆术,用纳米机器人携带花纹孢子,将孢子制成烟花射入天空,绽放后落在人们的皮肤上,形成16小时后就会代谢掉的短暂刺青。刺影术的存在进而变成了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人们慕名而去,接受从天而降的艺术洗礼,却不知道这刺影里保存着制作者沉重的历史记忆。《袍子》书写了两种伤痕,两种面对记忆的态度:第一种伤痕是父亲遭受历史暴力的击打,第二种伤痕是儿子面对历史记忆无法承受。前面一种伤痕和“感时忧国”的文学主流,与启蒙理性的传统,与“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律令相关。有意思的是,糖匪同时注意到上述两种伤痕、之间的摩擦与张力,她为子一代保留了一声微弱的抗辩,记忆延续的正当性何在?这让金理想起鲁迅那句著名的话:“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我想说的是, 闸门底下的父亲,如何理解闸门背后新人类们的生活,如果在闸门这一边的启蒙、理性与历史主义等已无法再有效定义闸门另一边的‘幸福’与‘合理’,那么面对后来者,作为守门人的父亲到底应该斥责还是祝福?就如鲁迅的‘中间物’意识所提醒的,也许没有任何一段历史记忆能够被神圣化、教条化,我们要把这些问题辩证地看。”金理说。

底层写作、打工文学、非虚构、铁西三剑客……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从辰说,新世纪文学中“记录在案”的事件都与现实密切相关,“包括科幻文学所诉说的困境也在现实中出现了”。

不过,他也注意到了新现象里的新问题。近十年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农村题材向城市题材转变,但目前来看城市题材的经典作品依然缺乏,“像《有生》这样的农村题材精品越来越少,城市写作越来越同质化、概念化,没有真正和城市发生肉搏。新生代作家层出不穷,但90后写作给他最大的感受是“冷淡”“没有认同,没有超越”,这是他不能接受的,“文学这个世界从来不是英雄的、精英的,应该提供一种更宝贵的东西。”

文学话语去权力化,中国当代文学终于“当代”了

山东大学教授马兵将“青年作家20家”入围名单,与十年前《人民文学》和盛大文学评选的“未来大家top20”进行了对谈,发现其中有的作家依然在榜,有的作家已然不在。可见,这十年间涌现了一些新的重要的青年作者。而在长篇小说榜单中,曾被各大刊物力推的十二三万字的“小长篇”这种文体,并没有出现在入围名单里,大部分作品字数都在三四十万字。这说明十年前批评界对“新世纪文学”文体发展的预判与实际走向还是有较大

距离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刚直言不讳地说:“科幻文学能够被纯文学注意到,是因为出了一个火出圈的刘慈欣,有《三体》这样的作品,使得原本这样一个‘孩童的游戏’,一群‘寂寞的伏兵’被我们看到。反观入围榜单中的36部长篇小说,对于大众来说,它们又何尝不是纯文学圈里‘寂寞的伏兵’。”徐刚认为,新时代的纯文学如何发展,“既不是跟世界无关的纯文学,也不是被现实所压垮的纯文学”,是每一个跟文学相关的人都要考虑的问题。

吉林大学教授李振观察到,新世纪二十年,作家们所面对的生活和现实有着共通性,但不同代际的作家,处理方式不太一样。比如班宇今年所写的短篇小说《缓步》,“小说里的缓步台究竟是什么意义?它存在的价值是让人们上楼的时候有一个休息的阶段,但这种休息不改变任何东西,只能让你在那暂时喘口气,继续往前走,整个小说讲述的也是那样一种生活”。对比一下70后作家的新作,路内的《雾行者》、阿乙的《骗子来到南方》,里面的人物面对困境或不甘时,总有一个出走的决心。面对相同的现实问题,70后作家更多选择出走、逃离,80后作家更多选择承受或者躺平,这种差异可能来自两代人更加微妙的心灵或个人处境,这一现象也可以成为观察两代作家精神世界的一个切口。

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梅兰以张炜的《你在高原》、李洱的《应物兄》、路内的《雾行者》三部长篇小说为例,分析了三种知识分子形象。“《你在高原》是一个追求精神纯洁性的知识人,生活在一个需要分辨善恶、真假的现实世界;《应物兄》写中外、古今文化交叉点上的文化人,游走在官、商、学之间;《雾行者》则是文学青年的视角,身份边缘,物质贫穷,他没有野心,除了文学野心。”

“不管选择什么主题人物故事,话语方式才是真正的文本现实,”在梅兰看来,几十年来很多作家围绕贴近现实、反映现实的思路去写作,但使用的大多还是权力话语,“要去教育,要去指导判断,像精神导师一样要给世界找寻一条出路,告诉大家该怎么办”。而《雾行者》的话语方式令她赞赏,“它写底层,写边缘人群,写文学青年和世界的关系,但作品的核心并不是处理和现实的关系,没有现实的野心,也不教育人,相反是一个文学的人怎么用文学去观察、理解、抵抗甚至修改现实的残酷和疯狂,小说里一切的意义指向文学世界,那是一个比现实更为真实可靠的存在”。

“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充满了权力的话语对人的塑造,要做人上人。而一个文学的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不应该在现实里面找到野心。当代文学的问题也许根本不是如何去表现现实,而是在文学的帮助下对那个权力之人的全面解构和松绑,对于文学文本来说就是文学话语的去权力化,这部作品让我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终于‘当代’了,因为它的人的形象是那么自由,文学青年的江湖情谊。”梅兰认为,《雾行者》这样的文本,才是金理所说的那种具有“对决性质”的文本。“相似的还有双雪涛的《不间断的人》,描绘出后人类时代的人的断裂与延续,写得非常动人。”